

從「大逃港」看香港內部不同地區居民身份認同的差異： 以新界與香港市區為例

盧凱軒*

摘要

本文以「大逃港」事件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內部不同地區居民身份認同的差異，聚焦新界與香港市區居民的行為模式與社會態度。雖同受港英政府統治，兩地居民因歷史背景、社會結構、文化心態差異，對逃港者展現出不同回應。研究發現，新界居民基於血緣、鄉土倫理與「中國人」身份認同，普遍對逃港者抱持同情，甚至冒險援助，展現出游離於港英與中國政權間的雙重身份與務實行動策略。市區居民則初期基於人道關懷表現接納，隨逃港者由非法入境者轉為定居者，態度趨向排斥，強化「本地港人」與「外來者」的社會區隔。本文指出，逃港潮突顯香港內部社群間潛藏的多元身份認同結構，亦為理解戰後香港社會結構與中港關係變遷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補足過去將「香港居民」視為同質整體的史學論述盲點。

關鍵字：大逃港、香港市區居民、新界居民、身份認同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 一、前言
 - 二、大逃港時期不同地區的社會面貌
 - 三、新界與香港市區居民的理解與態度
 - 四、結語
-

一、前言

20 世紀 50 年代末，中國展開了一場以追求工業與農業產量急速增長為目標的「大躍進」政策，其影響範圍與 2019 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相似之處。兩者皆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波及全國城鄉，令百姓無從倖免。若將 2019 年的新冠疫情視為當代最具破壞力的公共衛生危機，則「大躍進」無疑是上世紀中國最嚴重、最具影響力的政策性災難。該運動之所以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根源在於當局缺乏科學規劃與理性決策，並透過政治運動將群眾熱情推向極端，最終導致經濟崩潰、糧荒肆虐，並釀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道主義災難。

在此背景之下，大批內地居民為逃避飢荒與政治運動帶來的壓迫，紛紛以生命為代價，冒險越境逃往香港。這場被稱為「大逃港」¹的事件，成為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一個極具象徵性的社會事件。大量逃港者的湧入，²對香港社會帶來了各方面前所未有的衝擊，也觸動了當時本地居民對於內地政局、社會秩序、公共資源與社會身份認同等議題的敏感神經。

然而，本文之目的並非在於強烈譴責「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會傷害，而是希望透過對該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進行探討，分析其如何影響香港居民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關係結構與情感連結。因此，本文除關注香港社會整體對逃港中國難民的態度與行為反應之外，亦特別著眼於新界居民（下稱鄉民）與香港市區居民（下稱市民）兩個不同社群，面對同一現象時所表現出的態度差異與行動方式，並嘗試進一步理解當中所蘊含的社會動機與立場背景。鑒於香港

¹ 「大逃港」嚴格而言並非一單一具體事件，而是一場歷時數年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運動。由於事件發生時間橫跨數年，不同時期逃港者的動機、背景與社會屬性亦有所差異。初期多以逃避飢荒與政治運動為主，及後則逐漸加入因經濟因素或尋求更佳生活條件者，反映出該事件隨著中國內地政治與社會環境變化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詳參陳秉安，《大逃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1 年），頁 18-369。

² 〈香港的難民問題〉，《華僑日報》，1957 年 8 月 5 日。

長期為多元族群社會，³為免族群背景混淆，本文聚焦於華人群體之身份認同與行為模式分析。

香港市區與新界之間的關係，自香港開埠以來便錯綜複雜，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釐清。兩者雖同屬一地，但由於歷史背景、社會結構與文化心態各有些許差異，早已逐漸形成各自獨特的社群認同與利益考量。猶如英國境內的英格蘭與蘇格蘭，雖同處於聯合王國之內，卻各自保有自身的歷史記憶、文化特徵與政治立場，彼此之間既合作共存，亦存在張力與分歧。

正因如此，若要全面理解當時香港社會對逃港潮的複雜反應，便不能將「香港居民」視為單一、同質的整體，而應細緻區分包括新界、香港島與九龍等不同地區居民的觀點與立場。本文即希望以「大逃港」事件作為切入點，從新界居民⁴與香港市區⁵的居民之行為表現與言論態度中，探討兩者在面對同一社會現象時的態度差異，進而分析其背後所反映的利益考量、歷史文化以及最為關鍵的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藉以勾勒出此時期香港社會內部潛藏的多元與分歧。

有關「大逃港」的相關研究，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涉足探討。無論是在香港本地，或於中國內地，皆有不同視角的學術著作為後人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與分析。例如，香港學者阮志於《入境問禁－香港邊界禁區史》一書中，詳盡記錄了當時邊境地區居民（即新界居民）對逃港人士的態度、行動以及香港當局的邊境管控政策，為理解當時社會氛圍與民眾心態提供了重要參考。⁶而中國內地學者陳秉安則於其著作《大逃港》中，描繪了當時逃港潮中的社會生態、民間傳聞與官方態度，是其中對於逃港研究中最為周詳的。⁷至於新界和港九有別的概念和研究，也能從臺灣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 Iva Vrzic（柳義娃）的“Hong Kong

³ 多元族群社會，在香港的美國籍，英國籍，葡國籍，印度籍，中東籍，華籍等

⁴ 新界居民多指原先居住於英國殖民政府所劃定之「新界」（New Territories）範圍內的原居民。他們主要為廣東本地族群與客家人，自清代以來即在該地區聚居，形成各具特色的鄉村社會與宗族結構，並於港英時期持續保留相對獨立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方式。詳參嚴瑞源編，《新界宗族文化之旅》（香港：萬里書店，2005），頁 1-2。

⁵ 本文所稱的「香港市區居民」，係指居住於九龍半島及香港島市區範圍內的居民。這些群體長期處於英國殖民政府的直接管治與影響之下，雖然普遍受殖民統治文化與社會制度所薰陶，但其政治立場與態度未必全然親英，亦存在多元而複雜的認同與取態

⁶ 阮志著，《入境問禁－香港邊界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3-216。

⁷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18-369。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 War Refugees, 1937-1941”中找到，也有證據表明中國的難民早在逃港熱潮就已經出現，也提出了中國難民與新界的關係。⁸

本文冀望能在上述研究基礎之上，結合香港社會內部不同社群之觀點，進一步分析新界居民與香港市區居民在面對逃港潮時所呈現的態度差異與行動選擇，藉此為「大逃港」相關研究添上一筆，期望為理解「大躍進」時香港的社會結構、身份認同與中港關係變遷提供新的補充視角與討論空間。

二、大逃港時期不同地區的背景與逃港者立場

本章旨在為後續探討逃港潮中不同社群對逃港者的理解與態度提供背景基礎，因此將先行分析香港島與新界的社會背景與文化結構，並進一步交代逃港者自身的行動動機與身份認同訴求，藉以勾勒出大逃港事件中的社會互動框架。

（一）香港市區與新界的背景與結構

英國對香港的覬覦始於 18 世紀末，當時主要目標集中於香港島及尖沙咀一帶沿岸。根據 1841 年 1 月英方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與清朝欽差大臣琦善的談判可見，義律曾提出以香港島及尖沙咀兩地換取停戰協議。琦善雖同意將香港作為停戰條件之一，但並未明確表示願割讓整個香港島。反之，義律則單方面希望據為己有，意圖將整個香港島納入英國版圖，並草簽了後來未被清廷（道光帝）正式承認的《穿鼻草約》，此為英方首次提出吞併香港的具體要求，亦是香港割讓史上最早但未正式生效的條約。⁹

其後，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正式確認清廷割讓香港島予英國，自此香港進入殖民時代。英國殖民當局隨即在香島設立一系列政府機構與軍事設施，如香港會所、最高法院和皇后像廣場等。¹⁰行政與經濟重心亦集中於香港島北岸的「四環九約」¹¹地區，標誌著英人最早的發展範圍以香港島為中心，並逐

⁸ 柳義娃著，《香港政府處理抵港難民的對策（1937-1941）》，（苗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83-89。

⁹ 黃鴻釗編，《香港近代史》（香港：香港學津書店，），頁 56-59。

¹⁰ 劉潤和、高添強著，《香港走過的路》（香港：三聯書店，2011），頁 124-125。

¹¹ 「四環九約」是指香港島早期不同地區的劃分，其中「四環」包括今日所稱的上環、下環、中環與西環，為港島主要市區範圍；而「九約」則泛指香港島其他各處的聚居地與鄉村社區。詳參香港歷史文化博物館網站，全文網址：https://hk.history.museum/tc/web/mh/exhibition/2009_past_02.html（2025 年 5 月 2 日點閱）。

漸奠定日後香港城市結構與社會形態的基礎。

不難發現，在 19 世紀 40 年代，香港島的城市意象已初步成形，其建築風格以「盎格魯式」平房為主，營造出鮮明的歐式殖民都市風貌。當時的中環建有至今仍保留的「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等建築，見證著該時期城市形態與文化遺緒。然而，在這片充滿英式或歐陸風格的都市環境之中，卻隨處可見華人和中華特色身影，有的為英人勞作，有的則以醉漢、乞丐等形象佔據街頭。¹²建築方面，荷李活道上的文武廟亦是當時華人社會的重要宗教與文化空間，¹³反映出中華傳統文化在殖民城市中的存在。此種空間與社會結構的配置，不僅體現殖民地權力運作與文化支配的特質，同時也構成一種中西文化交融的局面，使香港島自殖民初期便呈現出濃厚的殖民城市特徵與文化混雜現象。

至於九龍市區，則可視為香港市區內第二個重要的城市核心，某程度上亦可看作是香港島市區的延伸。相較於香港島那種濃厚且早期確立的殖民色彩，九龍市區的殖民印記雖略遜一籌，但亦非全然缺席。當中代表性的建築包括九龍首間高級酒店——半島酒店，以及標誌性的英式建築——尖沙咀鐘樓。¹⁴

九龍的城市發展相對較為緩慢。從 19 世紀末的歷史照片可見，當時九龍半島仍呈現典型的中式農村景觀，並設有傳統的中式集市。¹⁵嚴格而言，當時所謂的「九龍市區」，主要指九龍半島沿岸地區，如油麻地、尖沙咀及現今黃埔一帶。至於九龍半島其他地區，如九龍塘、何文田等內陸區域，則尚未開發，¹⁶並被港英政府劃為新界的一部分，與當代對「九龍市區」的理解存在相當大的落差。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與九龍半島納入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時序有關。英國在 1842 年透過《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但直到 1860 年的《北京條約》才將九龍半島南部（界限街以南）劃歸英國，¹⁷殖民政權對九龍的全面佔領與城市規劃，也因此略晚於香港島。因而，才造成了此等的發展與城市面貌的落差。

¹² 珍·莫里斯著，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新北：八旗文化，2017），頁 92-93。

¹³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01），頁 30。

¹⁴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01），頁 126。

¹⁵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01），頁 55-149。

¹⁶ 劉潤和，高添強著，《香港走過的路》，頁 105。

¹⁷ 黃鴻釗編，《香港近代史》，頁 76-77。

英國接管新界的時間較接管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為晚，約相差 50 年，始於 1898 年英清雙方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此次租借範圍自沙頭角至深圳灣一線以南，至九龍界限街以北，¹⁸奠定了香港島與新界之間的行政劃分基礎，亦為本文討論範圍內的新界與香港島區分提供了歷史依據。

相較於高度城市化、受殖民文化影響甚深的香港島，新界長期保留了濃厚的中式傳統文化與農村社會結構。新界地區以農業為主，村落與圍村為主要聚居單位，¹⁹鄉民大多依循宗族血緣而集體生活。宗族制度在新界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並常以姓氏劃分，如「五大姓」²⁰等。地方事務多由村代表或宗族長老協調處理，鄉規民約與宗祠祭祀制度仍廣泛存在，構成與香港島迥異的社會樣貌。此外，鄉民普遍信奉傳統中式宗教，村落內興建多座寺廟與祠堂，其中尤以松嶺鄧公祠、天后宮等最具代表性，²¹至今仍為當地重要的宗教與文化場所，反映出新界社會對傳統信仰與習俗的高度依附，同時亦體現出有別於香港島的社會樣貌。

由此可見，香港島與新界在城市發展、社會結構與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奠定了日後兩地居民對逃港潮反應不一的重要基礎。”

（二）逃港者社會處境與身份需求

中國內地與港英殖民地之間的接壤地帶，主要位於寶安（下稱深圳）與香港新界一帶。當時，持有合法證件的民眾通常經由羅湖橋作為正規通道，往返於兩地，而且通過羅湖橋後還能直接搭乘火車進入香港市區。²²然而，對於大逃港時期的難民而言，他們無法透過合法、正常的手段進入香港，只能選擇偷渡方式潛越邊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逃港者的目的並不僅止於成功踏足香港境內，而是期望能藉此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從而徹底擺脫中國內地嚴苛的政治與經濟處境，

¹⁸ 黃鴻釗編，《香港近代史》，頁 82-87。

¹⁹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 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61-67。

²⁰ 新界原居民社會中，以「鄧」、「廖」、「侯」、「文」、「彭」五大姓氏最為知名，並長期主導當地宗族村落與社區結構。然而，根據口述歷史與地方傳說，除上述五姓之外，亦有其他姓氏原居民散居於不同地區，例如新田的「潘」氏、錦田的「陳」氏等，構成新界多元而緊密的宗族聚落網絡。詳參嚴瑞源編，《新界宗族文化之旅》，頁 9-25。

²¹ 嚴瑞源編，《新界宗族文化之旅》，頁 36-38。

²² 〈大陸難胞逃港實況〉，收錄於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https://reurl.cc/papO9Q>，（2025 年 5 月 6 日點閱）。

並於香港這個相對「人道」且社會制度較為開放的殖民地社會中，尋求穩定生活與未來發展的空間。

這種身份轉換的渴望，既是對內地政治高壓與經濟困頓的逃避，亦是對香港殖民地社會中相對穩定的生活條件與自由空間的嚮往。從一封逃往港澳、最終輾轉至臺灣的手寫信中，便可一窺當時逃港者普遍的心態與立場。儘管信件所述者最終逃抵澳門而非香港，但其內容仍能清晰呈現中國難民在出逃過程中所處的社會處境，以及他們對當時政局與生活環境的理解與感受：

我小時候生活在在一個快樂的家庭里，也有過幸福的童年。但大陸
塗匪後，沒幾年，我母親就因政治問題，被共匪抓去勞改，我也成
了反革命子女，共產黨還企圖誘惑我，希望我和許多無知，盲目的
青年一樣，演出所謂站穩立場，脫離母子關係的悲劇。我因為沒有
這樣做，所以我沒有書念，也沒有工作做.....²³

對於這批來自內地的難民而言，獲取合法身份不僅意味著能夠在殖民地法治體系的庇護下生活，免於遭受遣返，重反如上述信件所透露出的「絕境」，更象徵著融入當地社會、尋求更佳生活條件與未來發展可能性的希望所在。

至於達成此目標的第一步，便是設法成功潛入香港境內。而在地理與行政區劃上，香港與中國內地接壤的前線正是新界。當難民成功潛入新界後，尚需設法抵達香港市區，並透過辦理身份證明文件，正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方能擺脫「非法入境者」的身份，且能擺脫被執法者遣返。這正是香港歷史上有名的「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所運作之背景與邏輯所在。²⁴

由此可見，逃港者並非單純為了經濟利益而離鄉背井，更蘊含對政治壓迫與身份重獲的強烈渴望。

(三) 新界與香港島作為逃港路線與身份「抵壘」的地理意涵

如前所述，中英接壤的邊界位於深圳與新界之間，換言之，所有逃港者幾乎必須先抵達新界，方能進一步潛入香港市區。根據陳秉安對逃港路線的研究得知，

²³ 〈大陸逃港澳門難胞上總統書〉，收錄於「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s://reurl.cc/VY2xoy>，(2025年5月6日點閱)。

²⁴ 蔡思行著，《香港史100件大史(下)》(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37-38。

當時逃港者主要採取三條相對固定且主流的偷渡路線。其一，西方向路線，逃港者自深圳白石洲一帶出發，經深圳灣偷渡進入新界；其二，中方向路線，自深圳布吉鎮出發，翻越梧桐山後，從羅芳村潛入新界境內；其三，東方向路線，難民直接穿越梧桐山山區，下山後由沙頭角或羅芳村一帶進入新界。這三條路線均以新界為逃港行動的首個目標地，反映出新界在整體偷渡路線中的前線角色與地理戰略意義。²⁵

相較於新界作為逃港者潛入香港境內的「前線」，香港島則幾乎成為所有逃港者的「尾站」。逃港者雖然成功潛入新界，但尚未能真正脫離非法入境者的身份，仍隨時面臨被執法部門拘捕與遣返的風險。《大逃港》一書中便生動描繪了這樣的情景：書中主人翁文素巧（化名）成功偷渡進入新界荃灣，急於尋找失散的丈夫，卻發現原先丈夫居住的地址早已人去樓空。萬念俱灰之下，文素巧流落街頭，卻因無合法證明文件被捕後送往偷渡者集中營，並遭遣返回中國內地。²⁶由此可見，單純進入新界並不足以保障人身安全，逃港者必須設法前往香港市區，尤其是香港市區，才能透過辦理身分證明文件，獲取合法留港身份。

本文其中一項關鍵論點，便是難民對於新界與香港市區之認知，實際上存在著顯著且獨特的差異性。事實上，港英當局並未於新界任何一處設立供市民辦理身份登記之設施，使得偷渡者即便成功潛入新界，亦無法於當地取得合法身份。基於此制度設計，新界鄉議局曾公開批評港府，指責其僅容許成功抵達香港市區的偷渡者獲發身份證，而抵達新界者則仍未獲合法居留條件。²⁷逃港者唯有設法抵達香港市區。親赴人事登記處辦理相關手續，方可換領有效且合法逗留香港的身份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登記設施主要設於香港島市區的紅綿道維多利兵房特別登記處，²⁸而非新界地區。這一安排意味著逃港者必須越過新界，進一步前往香港島市區，才能完成身份登記。與本地居民的身份登記地點不同，²⁹逃港者的登記點顯示出地理上的不平等，進一步凸顯港英政府制度性設計對逃港者的區別對待。這一安排不僅構成逃港者行動路線的重要依據，也深刻形塑了他們對

²⁵ 具體而詳細的「偷渡香港路線圖」詳參閱陳秉安《大逃港》之封面頁。

²⁶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95-114。

²⁷ 蔡思行著，《香港史100件大史（下）》，頁37-39。

²⁸ 〈非法入境者領證手續〉，《大公報》，第四版，1980年10月24日。

²⁹ 〈新春假期完結謹記換身份證〉，《工商日報》，1953年2月18日，頁6。

新界與香港市區兩者截然不同的空間屬性與意義的認識。

表 1：港九新界登記處分佈

地區	登記地點名稱	地址	位置說明
香港島	銅鑼灣裁判司署四樓	銅鑼灣裁判司署四樓	港島人事登記處
	第一分站	北角街坊福利會	/
	第二分站	李寶椿大廈三樓	生死註冊處辦事處
	第三分站	堅尼地城街坊福利會	/
九龍	必（畢）打街郵政局	德輔道中必打街口	/
	九龍分處	柯士甸路十七號	九龍人事登記處
	第四分站	旺角街坊福利會	/
	第五分站	紅磡農圃道	紅磡生死註冊處
	第六分站	元洲街十五號	郵政局大廈
	尖沙咀郵政局	疏士巴利道	/
新界	無	港英政府未於新界設置任何身份登記設施	/

資料來源：「新春假期完結謹記換身份證」，《工商日報》，1953年2月18日，頁6。

簡而言之，新界作為逃港過程中的一個過渡區，而港島則是整個逃港路線的終點。港英政府在地理劃分和身份登記制度上的設計，直接影響了逃港者的生存策略，也反映出逃港者對這些空間不同功能的認識與操作。

三、新界與香港市區居民的理解

前章已釐清香港島與新界在戰後時期香港社會結構中的歷史背景，並說明逃港者於兩地所承載的不同空間意涵與社會角色。本文亦初步分析了港九市區與新界對逃港者之地域性意義的差異。基於此脈絡，以下章節將進一步聚焦於兩地居民在面對逃港潮時所展現的不同態度與行為模式，藉此探討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動機與身份認同意涵。

須指出的是，當一個地區或城市於短時間內湧入大量難民與非法入境者，勢必對當地社會結構、經濟秩序及公共資源分配產生深遠影響。香港亦未能例外。為進一步分析新界與香港市區居民對逃港潮的不同回應，本節特以 1980 年一篇刊於香港報章的社論作為切入點，藉以觀察當時社會輿論對逃港現象的基本態度

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價值觀與政策取向，並為下文兩地社會反應之比較提供時代語境與輿論背景。

工商界人士都知道很清楚，近十年來香港好些行業包括紡織業和建造業，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偷渡入境者正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所以他們入境後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他們為香港創造了財富。香港當局過去以不歡迎的姿態歡迎了偷渡者，豈偶然哉？今天，香港外受西方經濟不景影響，內因長期執行高地價政策，以致通貨膨脹，有些出口行業不振。同時，像「地鐵」那樣大型工程，亦已大部分完成，這才發覺廉價勞動力已經飽和，而居住、交通、福利等問題日益嚴重……³⁰

從這篇刊載於 1980 年的報紙社論可見，當時的香港社會早已歷經多次由中國內地政治運動所引發的大規模逃港潮，包括大躍進期間的饑荒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政治迫害。此篇社論某程度上可視為對整個「大逃港」現象的一則時代觀察與階段性總結，但其觀點與立場卻難以完全涵蓋當時社會各界的多元觀感。顯然，該社論敏銳地指出香港紡織業、建造業等行業長期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而偷渡者正好滿足了這項結構性需求，成為戰後香港經濟迅速起飛的重要推手之一。隨着 1980 年前後香港經濟環境逐漸出現變化，外圍西方經濟不景與本地高地價政策所致的通貨膨脹，令廉價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偷渡者遂由「經濟功臣」轉變為治安、交通與社會福利的負擔來源，反映出殖民政府治理思維由默許、縱容轉為收緊與嚴打的轉向。

然而，本文認為該社論的觀察與措辭，並不足以代表當時整個香港社會對逃港潮的全面理解與態度。尤須注意的是，香港由港島、九龍及新界三個地理空間構成，各自擁有獨特的經濟、歷史、文化、社會與政治背景，因而難以以單一的社論視角概括全港市民對逃港者的態度與理解。逃港潮在不同地區間所激發出的社會想像、身份認同與空間意涵，亦存在差異，這亦正是本文企圖透過逃港者路線選擇與「抵壘」機制，分析不同地區居民身份認同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新界居民的表現與態度

³⁰ 章乙君著〈『非法入境者』問題平議〉，《大公報》，第四版，1980年10月24日。

如前言所述，鄉民與中國內地民眾（尤其是廣東地區）在文化背景上有著較高的相似性，且長期以來受到殖民統治的影響相對較淡薄。因此，面對自內地湧入的逃港者，新界居民普遍展現出相對同情與寬容的態度。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無條件接納或積極協助來港難民，當中仍存在許多值得深思與探討之處。例如，他們往往會作出一些看似矛盾甚至自相矛盾的行為。本文將透過具體觀察與案例分析，嘗試剖析這些矛盾態度背後的社會動機與身份認同意涵。

在 1962 年在華僑日報中刊登了一事關於新界與中國難民的互動和觀察：

雖然新界邊境各村的村民男女，都怵於當局。對於收藏容非法入境者予以嚴重之處罰，但屋舍外之河邊，禾草堆，田基，蔗林之間，匿伏着若干小股飢民男女，即使為巡邏之軍警所查獲，似無可能入罪於某一村民。記者曾間道走進幾條小村內，均為村中男女投以詫異之眼光，經道達來意說明此行乃意欲知向難胞訪問家鄉近況而已。答話的村民謂，匿者或不允露面，其後再三叮囑囑咐，着採訪後不要在報紙上發表。³¹

記者目觀此三五成群分別蹲於草堆之間，上有紅藍之透明膠質雨衣張開以逾陽光，他們或她們的身傍均堆滿熱心人士派贈的麵包與餅食包裹，他們說幾天來都恩感村民等煮粥療飢，他們蜷伏着是等待與家人戚友聯絡與接引。³²

據一熟悉新界地理之鄉民說，自大陸飢民偷渡入境之三週來，估計避過軍警拘捕求得「歸宿」者，起碼有一萬人以下，六千人以上……³³

本文之所以選取此則史料作為觀察鄉民對逃港者態度與行為模式之分析素材，乃因其內容生動反映了當時新界鄉村社群在殖民政府法令壓力與鄉土倫理情感之間所處的矛盾處境。首先，該史料顯示，鄉民對逃港者並未抱持冷漠或排斥態度，反而展現出相當程度的同情與熱心。他們透過提供食物、飲水與藏身之所等方式，試圖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援助這些來自內地、處境困頓的難民。由此可見，鄉民對內地同胞懷有濃厚的親近情感。

³¹ 〈逃脫者匿伏者頗眾〉《華僑日報》，1962年5月23日，頁1。

³² 〈逃脫者匿伏者頗眾〉《華僑日報》，1962年5月23日，頁1。

³³ 〈直昇飛機經常出動〉《華僑日報》，1962年5月23日，頁1。

同時，從鄉民面對記者突訪時所流露出的警惕與戒心，可見其對於港英政府執法與可能追究的懲罰仍存有極大顧忌。³⁴因此，鄉民一方面以實際行動支援逃港者，另一方面則選擇與官方維持表面上的距離，進行某種形式的『冷對抗』。這種雙重態度，正體現了新界社群在殖民統治與華人傳統鄉土倫理價值交織下的複雜社會心理與行為模式。

結合以上，我們也能從中得知，新界作為逃港者的第一線，或許並不是單純作為整個逃港路線的緩衝區而已，而是另外的進入了一種與鄉民合作的臨時收容網絡，逃港者透過新界鄉村先藏匿數日、待與城內親友聯絡，再轉移至九龍、港島辦理登記。

不過，鄉民所展現了不只有這一方面的態度，從現已退休的蓮麻坑前村代表葉秋平憶述當時在邊界的生活情景可見：

我有派過食物俾那些偷渡客，當時有嘉頓麵包車駛到村口派食物，我便拿些麵包上山俾啲偷渡客食。但當時英軍要在山上建第二條防線阻截偷渡，需要一些村民幫手建鐵絲網，我為了生活也去做，賺數元一天，我記得當時從木湖一直起到蓮麻坑，因為從對岸蓮塘那邊過來的人最多……當時係負責打啲鐵柱呀，又抬鐵絲網上山，都幾辛苦，我們並用鐵鉗去鉗成品字形，網拉長了有成個人高，做咗個幾兩個月。³⁵

由此可見，鄉民在逃港潮中的角色，實屬靈活而多變。他們一方面是港英政府邊境防線的重要輔助力量，協助修築鐵絲網、圍堵逃港者，另一方面卻又是逃港者潛伏與獲取食物的重要支援網絡。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身處殖民政府法令與鄉土倫理的雙重壓力下，他們對逃港者的同情心始終未曾減退，展現出高度務實而富人情味的社區（鄉土）互助文化。這種『雙重角色』正是鄉民身份認同與社會行動策略複雜性的最佳體現。

以上可見，鄉民這種行為表面看似矛盾，實則反映了當時基層民眾在生計壓力與倫理情感之間的權衡。他們既不忍坐視同胞受苦，但面對自身經濟問題與殖

³⁴ 〈協助他人入境，影響民生安定〉《華僑日報》，1957年8月5日，頁6。

³⁵ 阮志著，《入境問禁－香港邊界禁區史》，頁52-55。

民體制權力時，也不得不選擇配合當局。

基於以上論述與史料，本文認為鄉民的身份認同主要體現於四大因素。其一，文化與血緣認同。鄉民視逃港者為「同鄉」、「自己人」，即使冒著法律風險，依然暗中提供食物與藏身之所，反映出他們對內地同胞的文化親緣情感，遠超對殖民法令的服從。

其二，鄉民展現務實的生計取向。正如葉秋平所述，為了賺取生活費，即使要協助英軍架設鐵絲網也在所不惜，但私下仍援助逃港者。這種行為看似矛盾，實則反映出他們在強權與生計壓力下，靈活調節、兩頭照應的務實生存倫理。

其三，游離於港英與內地政權之間的身份模糊。新界當時殖民統治色彩相對淡薄，與市民不同，他們並未完全視自己為「英國治下之臣民」，但同時亦不完全效忠中國政權。這使得他們處於一種「兩頭不靠邊」的邊界認同狀態，但他們都以本地社群利益與鄉土倫理為較高依歸。

其四，鄉土倫理與集體互助網絡。村落式社會維繫着強烈的互助倫理，鄉民幫助逃港者，不單是出於同情，亦與維護村內聲譽、維繫人情網絡有關。如史料所載的「採訪後不要在報紙上發表」，反映出這種「自己人幫自己人，外人免問」的閉鎖性社群認同。

（二）香港市區居民的表現和態度

要判別和界定市民的身份其實存在一定難度。如本文所界定，港九地區的華人群體多數並非香港原居民，他們往往來自不同時期的移民與難民背景。例如，最早在 1850 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國內地民眾為了逃避戰亂，紛紛移入香港。³⁶再者，1937 年至 1941 年間，因抗日戰爭而逃難至香港的內地居民，當時港英政府將這些難民安置於北角、九龍塘、英皇道等港九市區。³⁷這些難民後來「有機會地」成為香港居民，亦有部分在港府的政策下返回原籍。³⁸但無論是否最終留港，他們及其後代均構成了戰後香港市區社群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當這些群體面對另一批自中國內地偷渡來港的難民時，這些在香港已定居多年的移民群

³⁶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頁 27-31。

³⁷ 柳義娃著，《香港政府處理抵港難民的對策（1937-1941）》，頁 80-82。

³⁸ 柳義娃著，《香港政府處理抵港難民的對策（1937-1941）》，頁 98-101。

體（難民和其後代），其觀感與立場未必一致。他們可能不一定經歷過逃難，但是至少身邊認識的人或家庭背景的經歷裏，都有「逃難」的這種元素。³⁹他們既可能基於同為過客、逃難經歷而抱持同情，也可能基於維護社會秩序、資源分配等現實考量而產生排斥心態，展現出多元而複雜的社會態度。

以下嘗試以香港的社會問題作為切入點，探討市民對於逃港者的到來，有 1980 年的一篇社論中，批評逃港者的移入導致許多的社會問題：

無證入境者不斷湧至，如果沒有來得及建立積極的設置，以資適應，的確給本港造成很大的困擾……在這些新措施出籠之前，此間有些報紙刊登過不少言論，認為無證入境者使本港居民的工作機會、居住、醫藥、教育、治安、交通；康樂……即生活水準全被破壞，大聲疾呼一番。⁴⁰

市民與鄉民的態度和表現上，都具有高度的相似，兩者對於逃港難民的經歷均表現十分同情。

鐘孝平 1959 年到港，他記得當時香港本地人“看到你沒飯吃給你飯吃，沒工作介紹工作，不收你錢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油麻地的金記運輸行做搬運，當時運輸行已經夠人了，老板看他從內地過來，還是給了他一份工作。⁴¹

從鐘孝平的經歷中，可見戰後市民與逃港難民之間的互動關係大致友善。儘管逃港潮導致人口激增，勞動市場壓力驟增，但並未因此出現全面排斥或敵對現象。相反，許多香港市民基於同鄉情誼、族群認同或人道憐憫，往往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難民提供食物、介紹工作，甚至無償救濟。鐘孝平所述「看到你沒飯吃給你飯吃，沒工作介紹工作，不收你錢的」正反映了當時社會基層之間的人情倫理與互助網絡，即使在資源有限、社會壓力沉重的環境下，仍維繫著一定

³⁹ 方冰著，《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中國生存》上世紀逃港中國人談用腳投票》，美國之音網站：<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fled-hong-kong-from-china-in-the-60s-and-heres-why-20220607/6607329.html>，參閱日期：2025 年 5 月 14 日。

⁴⁰ 〈非法入境者領證手續〉，《大公報》，第四版，1980 年 10 月 24 日。

⁴¹ 深深著，《那一年，他們逃港了：一代逃港人的生存與歸宿》，界面新聞網站，全文網址：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68853.html?_t=t。（2025 年 5 月 13 日點閱）。

程度的互助與包容。

而且，就當時環境而言，工作機會不少，甚至是短缺。前文所提及的文素丈夫立健的經歷可見：

這時，只要那個「鬼佬」走過來十步，他倆就只有舉手了。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們聽見那「鬼佬」用生硬的中國話：「上來吧，不抓你們。」立健和旺狗以為是聽錯了，但那兩個英國兵還在向他們揮手：「上來啊，不抓你們。後來才知道，英國人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香港要勞工……他們就這樣順利到達了香港市中心。香港工作好找：他們很快進了一家手錶工廠。一日三餐都在廠裡。⁴²

雖然，逃港者的基本工作需求漸漸得到解決，大多難民普遍不能馬上投入高等勞動力的，⁴³他們即使在內地完成高等教育也未必能獲得認同，而且難民組成的結構大多是中國內地的難民，是為香港社會結構中的低下層，主要成為香港加工業的基礎勞動力，⁴⁴所以，本地港人普遍的職業與難民的職業有別，不太足以構成與市民展開惡性的工作競爭之說。但是，難民在住屋問題上香港一直飽受困擾。在 1957 年有如此一篇報道：⁴⁵

當他們逃到港九以後，僅光著一身，投靠無門。除呼吸自由空氣外，吃的，穿的，住的皆無著落。多迫而晝則沿門乞討，夜則露宿街頭。飢寒疾病，交相侵迫，哀號婉轉，慘絕人寰。

在當時逃港潮的社會環境下，港九市區出現了大量難民，他們之中部分得以投靠在港親友，但絕大多數則寄居街頭，如屋簷下、樓梯間，甚至棲身於山洞之中。⁴⁶如上述，港九市容儼然成為難民之城。不過就筆者翻查當時報刊觀察，如《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等，並未見因市容問題而引發市區騷動，顯示市容

⁴²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108。

⁴³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268。

⁴⁴ 宗家秀著，《闖過去，你就是香港人！》，大紀元文化網，全文網址：<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8/26/n11478303.htm>，(2025 年 5 月 14 日點閱)。

⁴⁵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268。

⁴⁶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268。

問題與難民和市民關係尚有觀察空間。

至於居住問題，雖然大量難民湧入，但並未與市民發生激烈衝突。主要原因在於逃港難民普遍經濟條件有限，多遷入租金較低廉的木屋區，⁴⁷與原本居住於唐樓的市民形成空間上的區隔，減少了直接摩擦。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亦在荃灣、觀塘等地將原本設計作衛星城市的地區發展為新市鎮，⁴⁸成功吸引部分市民和部分難民遷入，進一步紓緩市區居住壓力，亦有助於減少難民與市民在空間與資源分配上的潛在衝突，但大部份難民者都只能入住木屋區。

然而，當逃港難民的身份逐漸由「過客」轉變為「定居者」後，他們與市民之間的社會關係亦出現微妙變化。根據逃港者莊永競初到香港時工作的經歷可見：

這天中午：我回來得晚了些，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師傅卻說：「你們沒飯了。」我還以為是我來晚了，但看見後來的伙伴都拿到了飯，便問怎麼回事。大師傅沒好氣地說：「今天飯少，要讓他們先吃，你們大陸來的沒這待遇！」一盒飯值幾個錢？太拿大陸來的不當人了！一氣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幹了！⁴⁹

由此可見，即便處於相似的經濟困境與社會條件下，市民與逃港者之間，仍維持著明顯的社會分層與身份區隔。本地居民透過將逃港者劃歸為「他者」，以鞏固自身既有的社會地位與社群認同。此現象體現出港九社會內部存在一套潛在的分級邏輯，不僅劃分本地與外來，亦依循語言、習俗與生活風格進行細緻分類。逃港者則普遍表現出強烈的融入意願，積極透過語言、衣着與生活方式等方面模仿本地居民。如語言上，儘管多數逃港者本已操流利廣東話，仍因未能完全掌握「港式」語音語調與用語習慣，而易遭辨識並排除於本地社群之外。在服飾衣着上，他們亦刻意學習當時港九青年的流行服飾，如牛仔褲、松糕鞋等，⁵⁰以期消

⁴⁷ 蔡思行著，《香港史 100 件大史（下）》，頁 58-62。

⁴⁸ 蔡思行著，《香港史 100 件大史（下）》，頁 151-157。

⁴⁹ 陳秉安著，《大逃港》，頁 297。

⁵⁰ 深深著，《那一年，他們逃港了：一代逃港人的生存與歸宿》，界面新聞網站，全文網址：<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68853.html?t=t>。（2025 年 5 月 13 日點閱）。

弭與本地居民之間的文化差距，尋求社會認同。從他們的逃港者的親身經歷反映，當逃港者身份逐漸轉化為「定居者」後，本地市民對其態度與行為表現亦產生轉變，由最初基於同情的救助，轉為更具防範與區隔意識的日常互動，亦能從中反向推斷出逃港者的行為，正存在這種身份階層的隱性差異，說明身份轉換與社會認同之間存在複雜的張力。

四、結語

經歷近 50 年殖民統治的新界與逾 100 年殖民歷史的香港島，在文化形態與身份認同上始終未能完全趨同，而「大逃港」事件正好提供一個切入點，讓我們觀察到香港居民絕非一個單一、同質的群體，而是由多元社群組成。本文透過比較鄉民與市民在逃港潮中的立場與行動選擇，以及兩者與逃港者之間的互動，進一步揭示了當時香港社會內部潛藏的多重身份認同與區域分歧。

綜合本文觀察，鄉民的身份認同表現為在文化與血緣上高度認同「中國人」身份，這一點從他們與偷渡者之間的互動中可見一斑。然而，鄉民對港英政府與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認受性則較為模糊，呈現出一種游移於兩者之間、兼具鄉村倫理與鄉土利益優先的「雙重身份」特徵。新界鄉民在面對逃港潮時，既維繫著鄉村宗族網絡與同鄉情誼，也考量自身利益與生存空間，展現出既務實又具人情味的態度。

至於市民，雖與鄉民一樣，對偷渡者懷有基本的同情心，並與逃港者維持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動，但當逃港者身份由非法「偷渡者」轉變為合法「定居者」後，市民則展現出更強烈的「本地港人」身份認同，對外來人口產生排他性，並藉此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與身份優越感。

最終，鄉民與市民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體現於兩者對「中國人」與「本地港人」身份的不同理解與詮釋。鄉民強調的是血緣、宗族與鄉里情誼，以及基於務實考量的社群利益；而市民則重視「本地身份意識」，在心理與社會層面上，建構出一套以「本地」與「外來」為劃分的社會分級邏輯，對內地人產生明顯的社會距離感。

本文希望藉此分析，補足臺灣史學史過去將「香港居民」視為單一整體而忽

略其內部差異的研究，並為理解香港社會結構與身份認同變遷，提供新的觀察視角。本文因資料取得困難和篇幅有限，未能以最為全面的視角解釋兩地社會居民的身份差異性，至少在篇幅上仍能在邊境問題、社會表現上論述，而資料上也未能利用當時港英政府的檔案資料，因此在本研究上有較多的限制和視野觀點較淺。冀望日後能夠補全以上缺陷。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非法入境者領證手續〉，《大公報》，第四版，1980年10月24日。
- 章乙君著，〈『非法入境者』問題平議〉，《大公報》，第四版，1980年10月24日。
- 〈協助他人入境，影響民生安定〉，《華僑日報》，1957年8月5日，頁6。
- 〈新春假期完結謹記換身份證〉，《工商日報》，1953年2月18日，頁6。
- 〈逃脫者匿伏者頗眾〉，《華僑日報》，1962年5月23日，頁1。
- 〈直昇飛機經常出動〉，《華僑日報》，1962年5月23日，頁1。
- 〈香港的難民問題〉，《華僑日報》，1957年8月5日。

二、專著

- 劉潤和、高添強著，《香港走過的路》（香港：三聯書店，2011）。
- 嚴瑞源編，《新界宗族文化之旅》（香港：萬里書店，2005）。
- 阮志著，《入境問禁－香港邊界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
- 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香港：中華書局，2014）。
- 黃鴻釗編，《香港近代史》（香港：香港學津書店，2004）。
- 陳秉安，《大逃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1）。
- 珍·莫里斯著，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新北：八旗文化，2017）。
- 蔡思行著，《香港史100件大史（下）》（香港：中華書局，2013）。
-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01）。

三、論文

- 柳義娃著，《香港政府處理抵港難民的對策（1937-1941）》，（苗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四、網絡資料

- 方冰著，「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中國生存」 上世紀逃港中國人談用腳投票，美國之音網站：<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fled-hong-kong-from-china-in-the-60s-and-heres-why-20220607/6607329.html>，參閱日期：2025年5月14日。
- 深深著，《那一年，他們逃港了：一代逃港人的生存與歸宿》，界面新聞網站，網

址：<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68853.html?t=t>。參閱日期：2025年5月13日。

宗家秀著，《闖過去，你就是香港人！》，大紀元文化網，網址：<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8/26/n11478303.htm>，參閱日期：2025年5月14日。

香港歷史文化博物館網站，網址：https://hk.history.museum/tc/web/mh/exhibition/2009_past_02.html。參閱日期：2025年5月2日。

五、電子資料庫

《大陸難胞逃港實況》，收錄於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網址：<https://reurl.cc/papO9Q>，(2025年5月6日點閱)。

《大陸逃港澳門難胞上總統書》，收錄於國家文化資料庫，全文網址：<https://reurl.cc/VY2xoy>，(2025年5月6日點閱)。